

刘雪枫 主编

JingShi
Philharmonic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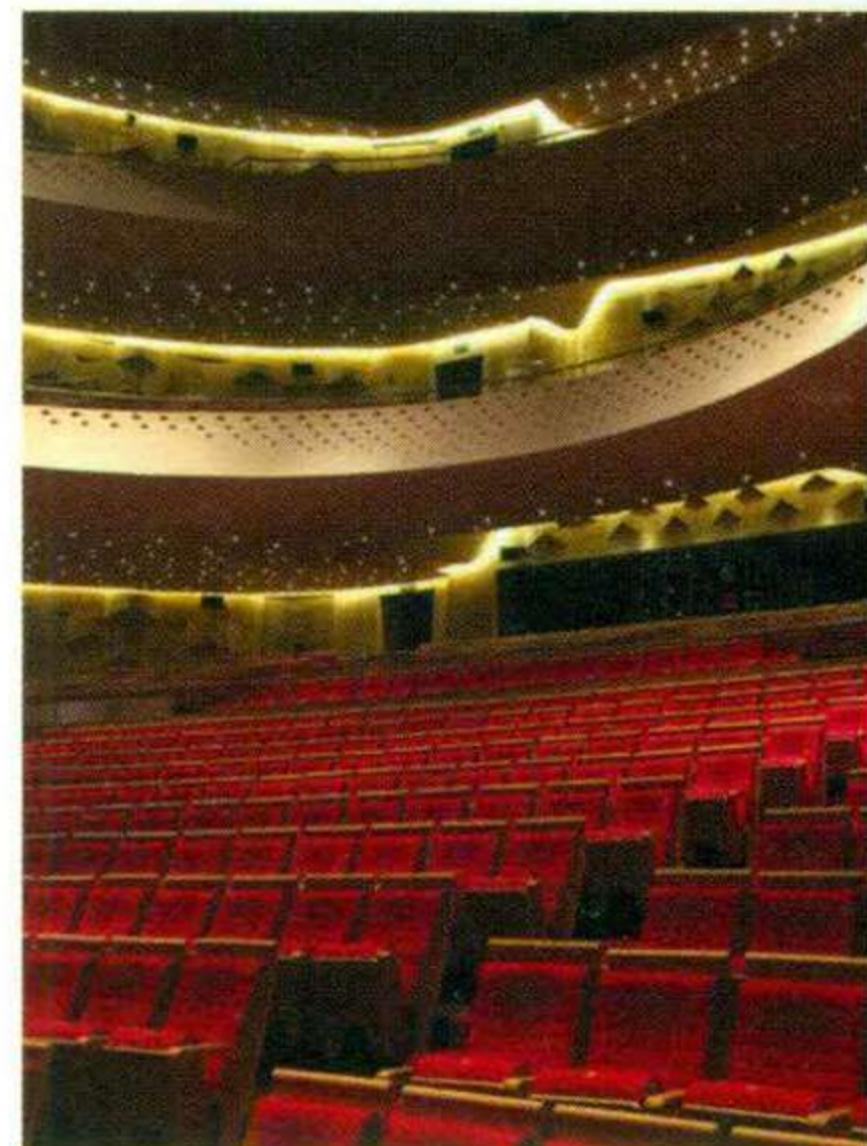


京师爱乐丛书

评音论乐

——中国乐坛备忘录

司马勤 著



评音乐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评音论乐：中国乐坛备忘录 / (美) 司马勤著；李正欣，
李百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京师爱乐丛书)

ISBN 978-7-303-21115-9

I. ①评… II. ①司… III. ①音乐欣赏—世界②音乐评论—世界 IV. ①J6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832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PINGYINLUNYUE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1168 mm 1/32

印 张：14.875

字 数：206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策划编辑：陈佳宵

责任编辑：陈佳宵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蔡立国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总序 音乐因你而动听

以音乐为职业的是少数音乐家，而与音乐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清晨去广场观礼升旗仪式，还是傍晚在家中收看新闻联播；无论是出席国家的盛大庆典，还是参加个人的生日派对；无论是出席生者的婚礼，还是参加逝者的葬礼……音乐总是环绕在我们耳边，激荡在我们胸中。《婚礼进行曲》让我们热爱生活，《葬礼进行曲》使我们珍惜生命；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让我们感动，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使我们振奋；一首《马赛曲》让我们想起法兰西民族的历史，透视出“自由引导人民”的壮阔历史画卷，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使我们想起中华民族的历史，透视出中国人民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

“没有音乐，国家无法生存”（莫里哀语）；“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尼采语）。音乐使最深刻的情感和最严谨的思想这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情感的鼓舞和思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贝多芬语）。

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一部音乐史，就是声乐和器乐此起彼伏、相互影响以至于相互交融的历史。从亨德尔的清唱剧、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到莫扎特、威尔第、瓦格纳的歌剧；从巴赫的协奏曲、贝多芬的交响曲，到德彪西的前奏曲、勋伯格的变奏曲；从帕勒斯特里那创造复调合唱、蒙特威尔第创造管弦乐队，到贝多芬创造声乐与器乐高度融合的《第九交响曲》；从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伯恩斯坦的电影配乐，到施特劳斯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交响诗，再到戴留斯同样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歌剧……音乐的不断发展体现着音乐家对人的声音与物的器乐如何在空气中振动的不断理解和创造，体现着音乐家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不断发现和建树。“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树，却又人人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星座，又各有自己的天地。在音乐中，巴赫发现了永恒，亨德尔发现了光辉，海顿发现了自然，格鲁克发现了英雄，

莫扎特发现了天堂，贝多芬发现了悲痛和胜利。”（海涅语）

哲学家黑格尔断定：“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并认为“灵魂中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所特有的领域”。音乐是“心情的艺术”，与音乐家个人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但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的“心情”，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体现，更不是仅仅出自音乐家个人内心的“纯粹声响”。从根本上说，音乐是主观创造和客观描摹的统一。音乐家个人“心情”的背后是社会“表情”，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背后是社会生活。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世俗音乐；无论是尼德兰音乐，还是巴洛克音乐；无论是印象派音乐，还是第二维也纳派音乐；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新古典音乐；无论是浪漫主义音乐，还是后浪漫主义音乐……都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和升华，体现的是人类的发展、社会的演变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透过“格里高利圣咏”、帕勒斯特里那的《教皇玛切尔弥撒曲》、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我们可以体会到

宗教的威严及其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纪演变的脉络；透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可以听到法兰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枯拉朽、无所畏惧；透过吕其明的《红旗颂》，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粗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他个人的悲凉的心情，而且能领悟出那个时代的痛苦的呻吟，领悟出俄罗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内心挣扎；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联卫国战争的惨烈、悲壮、崇高，不仅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战争中的“所有亡魂”，不仅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悲伤之情，而且能体会到整个苏联人民的燃烧的激情……“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罗曼·罗兰语）如果说哲学是为历史留下的理论的反思，那么，音乐就是为历史留下的声音的注解。在我看来，音乐是人类的“心情”，是社会的“表情”和历史的回声。

从表面上看，哲学与音乐互不相干，实际上，二者具

有高度的关联性。哲学“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冯友兰语），而“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歌德语）；哲学的目标是使人追求并“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语），而音乐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亨德尔语）。“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语），如果说社会变革在英国首先表现为经济运动，在法国首先表现为政治运动，那么，在德国则首先表现为哲学运动，而“音乐是德国的语言”，“德国的最高表现，也许只有通过音乐才能鲜明地表达出来”（雨果语）。

历史上，黑格尔用哲学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贝多芬用音乐为法国大革命热情讴歌。黑格尔专门研究过音乐的性质和“特殊定性”，其哲学思想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贝多芬专门到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其交响乐不仅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而且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着贝多芬的“乐思”，而且体现着他的“反思”。如果说舒伯特是“音乐的诗人”，那么，贝多芬则是“音乐的哲人”。

在现代，施特劳斯根据尼采深奥的“超人”哲学创造出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图运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去演绎抽象的哲学形式；克尔凯郭尔在莫扎特的音

乐中发现了“本真的自我”，所以，克尔凯郭尔关心莫扎特的“荣耀”甚于他自己的“幸福”，关心莫扎特的“不朽”甚于他自己的“存在”；布洛赫根据对音乐的研究写出了《音乐哲学》，力图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中发现超时空的精神；阿多诺则根据对勋伯格音乐的研究写下了《新音乐哲学》，从音乐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倾向中发现了音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如此等等。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哲学的本义就是“爱智慧”，我当然“爱智慧”，但我也“爱乐”。我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景——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我也成为一名爱乐者。一首手风琴独奏曲《马刀舞》，不仅使我感受到手风琴的“风采”，而且体会出哈萨克民族的奔放；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不仅使我感受到小提琴的“华丽”，而且领略到天山景色的美丽；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走西口》，不仅使我感受到大提琴的“深沉”，而且领略到陕北风光的苍凉；莫扎特的奏鸣曲使我享受安宁，贝多芬的交响乐使我感受激情；在莫扎特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糅碎，融化为一种“天使般的抚慰”（傅雷语），升华为美丽的“天堂”，在贝多芬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碾碎，转化为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升华为崇高的境界。“谁

能理解我的音乐的意义，谁就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根拔的苦难。”（贝多芬语）……如果说哲学给了我智慧和信念，那么，音乐则给了我意志和信心。

在生活中，“爱智慧”，使我“看破”人的感性世界；“爱乐”，使我“看透”人的感情世界。尽管在人的感性世界中存在着“天生”般的矛盾，在人的感情世界中充满着“天问”般的苦楚，但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已无惊心动魄的震荡，我已是“波澜不惊”、“荣辱不惊”。我深知，在感性世界，人们往往“身不由己”；在感情世界，人们常常“心不由己”。哲学和音乐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离开哲学和音乐，我既不知如何生存，也不知如何生活。如果说哲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根，那么，音乐就是我“安心立命”之本。

无论是“爱”智慧，还是“爱”乐，“爱”都需要培养。“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马克思语）因此，我们向读者献上这套《京师爱乐丛书》。

从这些随笔的作者看，他们都是历经数十年“爱乐”岁月积淀的“行家里手”，都是至今仍活跃于音乐界、媒体界和出版界的“赏乐高手”。这里，既有西方主流乐评

界的资深主笔，也有见证中国香港古典音乐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活化石”；既有资深的音乐媒体人、卓有成就的海外艺术大师，也有“爱乐”爱到深处的经济学家、企业经理人、剧院管理者、国家公务员。这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音乐造诣、值得信任的作者群。

从这些随笔的内容看，这是中西的音乐学者、爱乐者对音乐的深度思考，或侧重于乐史钩沉，解读经典；或沿着音乐发展的轨迹周游列国，寄情音乐的山水故园；或驻足沉思，书斋神游，与大师对话，寄语音乐的精神家园……从而以不同的行文风格、迥异的音乐趣味、独一无二的赏乐感受，为我们全方位并立体化地呈现音乐的宽幅画卷及其无穷魅力。其意义不仅在于梳理和解读音乐经典，更在于能够将作者的情真意切、锲而不舍的爱乐情感、经验、知识传递出去，撒播开来，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入爱乐者的行列。

读着这些随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马勒、布鲁克纳、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德彪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勃兰登堡协奏曲》、《哈利路亚大合唱》、《费加罗的婚礼》、《唐璜》、

《朱庇特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欢乐颂交响曲》、《自由射手》、《幻想交响曲》、《理想交响诗》、《仲夏夜之梦》、《尼伯龙根的指环》、《卡门》、《茶花女》、《悲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牧神午后》……这是一个斑斓五彩的画面，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促发起你爱乐的激情。深度的音乐欣赏需要高度的理性修养，从而形成一种“理性的激情”；当你具有这种“理性的激情”时，你就会感到音乐是为你而奏响，因你而动听。

“爱乐”使我结识了《京师爱乐丛书》的主编刘雪枫先生；也正是因为“爱乐”，使我自不量力，又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刘雪枫先生的邀请，为《京师爱乐丛书》写下了这篇序言。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董事长

2013年12月20日

序

有时候，位居第二是一件好事。我从事乐评工作的这些年来——我往往不是报纸杂志唯一负责评述音乐动态的乐评人——总有一位比我年资更高的同事。首先，这代表每当我从小报社换到更有名望的、规模更大的报社时，总有一位前辈做榜样，我可以向他学习。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探索音乐艺术的旅程，从来都没有停下来。

你看，首席评论员差不多没有选择，永远都要扮演“好人”这个角色。首席乐评人必须忍受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季开幕再一次搬演《波希米亚人》，或者纽约爱乐乐团再次演出整套勃拉姆斯交响曲。而我才是那位被派往纽约曼哈顿岛的南北角落，或是邻近新泽西州，那些又深又暗的偏僻地区的人。

那些远离聚光灯的角落，才是发现下一位伟大的钢琴家，或是正在尝试新概念的即将一炮而红的青年作曲家，以及边缘艺术晋升为主流的场所。乐评人的工作，是报告当时发生的事情，并预测下一步的去向。

我还是怀念从前在纽约报社工作的日子，就是我全职报道中国动态之前的年份。千禧年之前，我还在为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 撰写乐评。一天，我收到“一大沓”录像带——是的，孩子们，从前有一种录像科技，格式名叫VHS——是弗勒德里克·密特朗 (*Frederic Mitterrand*) 执导的歌剧电影《蝴蝶夫人》。盒子上还贴着简短的指示：“450字的评论”。之后，首席乐评人打来电话解释说，因为他刚被聘为索尼唱片的项目顾问，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不能撰写任何有关索尼出品的评论。于是，那一周，我突然晋升为影评人。

《蝴蝶夫人》令我印象深刻，因为自泽菲雷里 (*Zeffirelli*) 以来，首次有一位电影导演懂得平衡歌剧应有的敏感度与电影式的故事叙述。电影中只有几个叙事环节出现了少许节奏上的瑕疵。此外，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终于不用再看着白人中年女子假扮日本少女。在荧幕呈现的各位演员与他们所要扮演的角色，无论是肤色与

年龄，都完全相符。

或许没有人预料到这套电影的前瞻性。首先，密特朗（前法国总统的侄儿）后来荣升为法国文化部部长。其次，在电影里崭露头角的“亚洲”演员——女高音黄英、女中音梁宁、男高音范竞马——是后来一大批登上国际歌剧舞台的中国歌唱家的排头兵。

几年后，我又碰上另一个案例。当年，我是新泽西州纽瓦克《明星纪事报》(Star-Ledger)的常任记者。因为首席乐评人正忙着报道新泽西州的夏季歌剧节，我当天的职责，是报道林肯中心莫扎特音乐节(Mostly Mozart Festival)的开幕式。当年莫扎特音乐节的曲目编排，显得特别沉闷——一位同行用上“音乐空调”来形容那些音乐会——但是那天的空气里好像总有一丝不对劲。那天下午，女中音突然取消演出。这场音乐会一早预告，将安排全国电视直播；她不亮相，代表音乐会突然失去20分钟的曲目。

开幕式的另一位独奏是郎朗，而这位年轻小伙子名副其实地“救了场”。从我的角度来看，郎朗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一早已经欣赏过他学生时代的演出（在新泽西州最深最暗的角落），是柯蒂斯音乐学院专场。1999年，他在

芝加哥交响乐团拉维尼亞夏季艺术节 (Ravinia Festival) 中临危立命，代替安德烈·瓦兹 (Andre Watts) 担任协奏曲独奏。可是，莫扎特音乐节却是另一回事。电视监制正在头疼，要用什么办法补加20分钟的曲目，郎朗——他的常演曲目中没有几首莫扎特作品——却提出一个巧妙的对策。他愿意弹奏李斯特改编自莫扎特歌剧的钢琴幻想曲《唐璜的回忆》(*Reminiscences de Don Juan*)。这部独奏作品的长度，正好是18分30秒。郎朗在拉维尼亞临时代替瓦兹时，第二天的报纸只刊登了一小则的报道罢了。而郎朗在林肯中心这一次亮相，却吸引了全国电视观众的眼球。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常到访过亚洲了。我首次踏足亚洲，是1998年。当年，我跟随奥菲斯室内乐团 (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 到访越南；他们是首支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巡演的美国乐团。那次，我在香港转机。因为有机会在那里停留几个小时，我坐地铁到中环吃了一顿饭，还购了物，对我而言，那算得上是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可是，我祖籍广东的贤内助（我们俩首次相遇在纽约，是越南之行的两年后）却不以为然。她在千禧年离开纽约，远赴香港大学任教。

不可否认，林昭亮策划的台北室内音乐节——尽管大部分节目都是协奏曲音乐会——是我第一次身驻亚洲报道东半球的古典音乐动态。千禧年初期，我经常飞往亚洲各地，在那里提交报道给我的编辑们，然后就赶回家，重拾我在纽约的生活节奏。过了不久，我发现，无论我身处哪里，我报道的音乐人物都是同一群人。

这些机遇造就了这本《评音论乐》以及已在京师爱乐丛书中出版的《谈音说乐》。差不多20年来，我为多份刊物撰文，但是不同报纸杂志的读者群与编辑的定位都不一样。像《乐》(*Time Out*)这类综合杂志或者是针对音乐爱好者的英国《留声机》月刊，他们要求预告式的报道，在演出发生之前让读者有所期盼。自2004年以来，我差不多没有间断地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他们却要求我提供演出的详尽叙述以及仔细分析。我经常为一份报刊撰写预告式文章，然后在另一份发表评论。

因此，这本书的内容与《谈音说乐》有一些重叠，不仅是人物，也包括演出或录音等项目。正如我在《谈音说乐》中所提到的，那本书的大前提是报道返回中国或刚离开中国的艺术家的想法与抱负。在《评音论乐》里，你会看到我对他们的演出与创作的评价。